

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落下帷幕。本屆會議尤其為國人和世界人民矚目。在國際國內經濟存在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和風險性的艱困環境下，不僅中國社會，而且國際社會都十分關切，希望本屆會議確定的方針政策、任務舉措會為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帶來重大利好。這也是國人和世界人民的期盼。舉世皆知，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進口國，潛在的世界第一大市場，2012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好與壞，不僅對13億人口的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動盪，而且對世界經濟的復甦與下滑，有着重大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本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佈的信息，令國人和世界人民看到了希望。

本屆會議為2012年經濟工作確立的主基調是：「穩中求進」四個大字。可謂是「穩」字當頭，「穩」是基礎；「進」字為綱，「進」是目標；「求」字是策，「求」為達標。中央會議之所以把「穩中求進」作為明年經濟工作的主基調，顯然是針對全球經濟和國內經濟面臨着眾多的不穩定因素，面臨着下行風險，尤其擔心國內經濟加速下滑，引發社會不穩定，導致社會動盪，因而特別強調必須保持經濟穩定，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可見，穩定經濟增長是明年中國經濟工作的第一要務。此次中央會議調穩定經濟，是充分考量到明年中國經濟增長受到國內外經濟不穩定且不可避免的下滑回落制約，因此把中國經濟穩定在8%左右的增速範圍內是必要且必做的頭等大事。

對中國來說，把經濟增長保持在8%左右增速的狀態下，才能解決年均近1000萬人就業的社會問題。經濟增長若低於7%以下，則不可避免會出現社會動盪。面臨尚處於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危機環境和今年美歐債務危機的嚴重衝擊，中國出口增速急劇下滑已成定勢，因而穩定經濟增長，也必須穩定出口貿易。儘管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亟須把主要依靠出口的外需型經濟轉變為主要依靠國內消費的內需型經濟，但在當前形勢下，保持出口穩定也是題中應有之義。與此同時，中國還必須不為西方國家的噪音所動，自主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以保證出口的穩定。總之，明年經濟工作的當務之急是，保持經濟平穩而較快增長，要穩定住經濟8%的增速，決不能讓其有較大幅度的下滑。

要保持經濟平穩而較快增長，就必須保持宏觀經濟政策基本穩定，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增強宏觀經濟調控的針對性、靈活性、前瞻性。本次會議強調，積極的財政政策要繼續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加大民生投入，促進結構調整。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適時適度地進行預調、微調，保持貨幣信貸總量的合理增長。明年貨幣政策落到實處，就要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中小企業、在建項目等實體經濟發展的支持。總之，需要適時、適度、適地、適切、靈活、合理運用貨幣政策以保障經濟的穩定增長，亦即平穩而較快地增長。

如果說穩定經濟增長是明年經濟工作的第一要務的話，那麼穩定民生增長則是明年經濟工作的第二要務。在中央會議的決議中，「穩」的第二、第三要點是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保持社會大局穩定。「穩」的這兩個要點其核心就是保障民生穩定增長。今年物價飛漲曾一度失控，飆升到6.5%，雖然此後逐漸回落，但不能說明年物價上漲勢頭已得到有效控制，也就是說明年物價仍有上行的壓力和風險。物價直接關乎民生，關乎千家萬戶、關乎社會穩定。一方面，需要加強物價調控，遏制通貨膨脹；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增加城鄉居民，尤其低層的收入和社會保障。這是應對物價上漲和平衡物價衝擊的最為有力的政策舉措之一。民生得到保障和改善，自然就有利於社會安定和諧，保持社會大局穩定。

更為重要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使之有可靠社會保障，無後顧之憂，自然會減少儲蓄；口袋中錢多了，就會改善生活品質，自然會增加消費、擴大消費。國內消費穩定上升，內需擴大，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方針任務的實施完成就有了堅實的戰略基礎。如何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央會議提出要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這兩者是實現增加消費、擴大內需的根本之策、解決之道。為此，必須加快說了多年的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但願這次說了算數，明年能成為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大刀闊斧推進實施的元年。

雖然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央領導人曾多次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橄欖形』分配格局」，建設「紡錘形」社會，但政府所採取的改革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十分有限。據有關的調研表明，中等收入者群體近年來還呈明顯的不穩定狀態和下降趨勢，這使得低收入人群比重明顯增加。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一是要保持中等收入者人群的收入與經濟發展同步穩定增長，二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群體的收入，使之不斷有收入進入中等收入者行列，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比例。中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結構調整的戰略思路是「提低、擴中、調高」，即提高低收入者階層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亦謂中產階層佔總人口的比重，調節高收入者的收入。當前，在這三個方面都是說得多做得少，即使在做的方面也談不上差強人意，尤其在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方面更令人失望。既然中央會議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列為擴大內需、改善民生的戰略基點，那麼提高中等收入者群體的比重就是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國民收入結構調整的重中之重。而這一重點的關鍵之處，就在於增加城鎮居民底層的收入，特別要提高農民工群體的收入。可以說，這也正是提高中等收入者群體比重的必由之路。

總而言之，一個「穩」字道出了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立的明年經濟工作戰略的核心，宏觀調控的靈魂。明年是關乎國家「十二五」規劃實施的承上啟下之年，關乎擴大內需保障民生的關鍵之年，為確保明年不能有任何重大的閃失，必須「穩」字當頭，「穩中求進」。這意味着明年是穩定之年。穩政策、穩經濟、穩出口、穩匯率、穩物價、穩民生、穩社會，是明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必然選擇。中國經濟社會穩定也是對促進在飄搖動盪中的全球經濟和國際社會穩定的不可或缺的傑出貢獻。

何俊仁為美領事解畫可恥

美 恩

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呂新華日前指摘美國駐港總領事楊魁棟，批評他早前公開評論特首選舉及區議會「種票」事件，屬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又暗示若楊再犯嚴重外交錯誤，不排除將他列為「不受歡迎人物」，美國駐港總領事館表明不接受呂的批評，英國駐香港總領事晏安竹更主動回應呂新華言論，表明會繼續與有廣泛代表性的港人會面，討論政治和經濟問題。而民主黨主席何俊仁也第一時間走出來，指外國領事若只是表達意見，他不覺有何問題，反而呂不准外國領事約見政界人士、不准他們表達自己的意見，根本就是干預言論自由，民主黨不會理會呂的言論，會繼續與外國領事交流見面云云。

何俊仁附和外國領事干預港事

英美領事的反應可謂預見之內，口硬不認乃是他們的本能，然而楊魁棟有沒有越界他自己應該心中有數。至於何俊仁的說話，筆者則感到失望，楊魁棟不單密約會反對派，還對香港的廉政公署對區議會會的「種票」案展開調查表示欣喜，楊魁棟作為美國駐香港領事已明顯超越了職權，《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和各國雙邊領事條約均明確規定，領館成員應有不得干涉接受國內政的義務，這包括必須避免一切直接或間接干涉駐在國內政的言論和行動，不公開批評駐在國的領導人及其內外政策。外國駐港領事機構活動時，應嚴格遵守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遵守駐在國相關法律，特別是《基本法》和香港特區各項法律，尤其是不能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對此，本身是律師，對條文分外敏感的何俊仁竟然不覺有何問題，他明顯失掉了判斷能力。

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一般市民和外國人在香港皆可以暢所欲言，對任何事物發表意見，惟楊魁棟並非一般外國人，他既是台灣「台獨」、中亞「顏色革命」老手，亦是美國駐港領事，應該受《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約束，不能超越半步。再者，「過門都是客」，身為客人的楊魁棟，怎可以如斯無禮批評主人家的屋內間隔，甚至指責主人家的未來裝修事宜呢？這已嚴重超越客人的身份，是對主人家的一種侮辱。若我們走進何俊仁家居，向他發表不同意見，一個說電視機放向東，一個說電視機擺在天花板，一個則認為不應該裝電視而應該棄掉，他是否

會嫌煩、是否會感到受侮辱，抑或視之為言論自由，繼續讓他們發表意見，還歡迎他們天天來家吃飯嗎？

何俊仁判斷力領導力大有問題

何俊仁的判斷能力和領導能力，筆者一向有所保留，早前「維基解密」才披露其黨友涂謹申和羅致光曾分別向美國領事通風報信，透露所謂的中央滲透民主黨內情和民主黨準備在政改上妥協，願意接受○五年港府政改方案的改良版，涂羅兩人更因此被領事館人員列為需要「嚴格保護」人物。對於民主黨資料外洩，身為主席的何俊仁視作等閒，對於黨友還做過什麼出賣民主黨的事而被列為需要「嚴格保護」人物，他亦詐作不知。早前區議會選舉，民主黨受到「人民力量」分頭狙擊，但身為民主黨元老的李柱銘，非但袖手旁觀不加援手，還非常「有心」跑到山頂選區為公民黨參選人陳淑莊拉票，置黨友於水深火熱於不顧，亦懶理黨友的感受，對於李柱銘公然分裂民主黨的荒誕行為，身為民主黨主席的何俊仁亦「不覺有何問題」，一於讓民主黨繼續分裂、繼續讓民主黨士氣低落；對於民主黨甘乃威涉嫌求愛不遂而怒炒前女助手一事，包括何俊仁的一眾大佬在早期是顯得「高度重視」的，還聲言作出什麼內部調查，但隨後未知何故，事情竟然「急轉直下」，何俊仁竟然支持民主黨以金錢賠償女助手「了個壞帳」。對於這件事，身為律師的何俊仁對外界起了一個壞壞榜樣。既然黨友涉嫌性騷擾，便要公事公辦、「大義滅親」，陪同受害人向警方舉報，將甘乃威繩之於法，而不是「繞過法律」，以大筆金錢「塞住受害人張嘴」，事件令外界產生錯覺，以為性騷擾是可以不了了之的，只要是有錢。對此，早前便有聽眾專誠打電話給電台，質疑何俊仁的個人誠信。

從以上的一些事例，我們可以知道，何俊仁無論在判斷力、管理能力、個人誠信以至價值觀皆大有問題，一個問題多多的入談論美國領事館干預香港主權問題，就像一個街頭瘋漢胡言亂語，當然亦難言中肯吧。身為律師的何俊仁，連《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條文也未有弄清楚、連國家的主權也不懂得捍衛、連香港的法律也不加以尊重、連一個民主黨也管理不好，便期望參選特首，難怪他的選情一致被看淡了。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
電郵：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2011年12月24日(星期六)

香港 文匯報 WEN WEI PO

輿論批評濫用法援 法援署難辭其咎

柳頤衡

由莊豐源案到外籍家庭傭工居港權案，本港近十年來牽涉的透過申請法援的司法覆核案件愈來愈多，對社會造成極大影響。據統計，2001年有147宗申請司法覆核，只有20宗得到法援；2010年增加到268宗申請司法覆核，93宗得到法援。輿論指出，同期成功申請法援的增長有4倍多，間接反映本港濫用法援現象不斷增加，若這個增長率維持不變，再過10年，每年便會有370宗以上獲法援資助的司法覆核案產生，即每天最少有一宗。公眾和輿論指出法援被濫用，法援署難辭其咎。

最近有兩宗官司，備受社會矚目，一宗是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的司法覆核，一宗是外傭居港權案，兩宗官司政府一勝一敗，兩宗官司都申請法援，結果同樣要社會付出沉重代價，同時令市民關注，動輒利用法援告政府的做法，是否符合公眾利益。

兩宗重大官司都申請法援

《頭條日報》今年10月3日的社評指出：「兩場官司同樣申請了法援，結果官司無論贏輸，都要由公帑付鈔，律師費用照收，納稅人卻被迫自己打自己。今次大橋和外傭官司帶來反思，令市民明白尊重法治不等於動輒興訟，濫用司法程序，只會對大眾生活帶來不便和干擾，對法治有害無益。」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在傳媒發表《司法覆核要正當正用》一文指出：「法援開支大增，就算政府財政仍可負荷，但是否有足夠的司法人員去處理？那便是個嚴重問題了。何況有些覆核案子事關重大，不能被擱置排期太久，否則司法糾紛一旦涉及類似港珠澳大橋、外傭居港權等案，以及重要的發展計劃，小的影響將是個別計劃受拖累而遭致財政損失，大的影響將是投資環境、長遠基建工程和市民福祉大受影響。」

上訴庭3位法官12月22日一致裁定，社會福利署毋須向一名公屋綜援戶退還政府3次寬免公屋租金及差餉金額。公屋綜援戶本已豁免交租金，該名公屋綜援戶反而入稟追討社署退還租金，而高等法院原訴庭去年判其勝訴。由於社署就有關裁決上訴至上訴庭，法援署批出法援予該名公屋綜援戶於上訴庭舉行答辯。法律界人士黃國桐指出，若市民濫用司法程序，不但會浪費公帑，此舉亦不合理。「唔係樣樣都可以司法覆核，好似福利制度，其實唔應該涉及公平（原則）……難道人人都要有生果金？」

「法援」基金始終有一個限額

公民黨黨員黃鵬鳴、郭榮榮及李志喜代表司法覆核申請人，參與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及外傭居港權官司，被外界質疑是「包攬訴訟」。有立法會議員要求法援署提交四宗與公民黨有關的司法覆核官司所涉及的法援金額。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透露，港珠澳橋環評官司的法援費用為149萬元，外傭官司則因未完結，而未有數字。輿論指出，「法援」基金始終有一個限額，太多濫用，當他日有人需要「法援」幫助，基金限額已用完，愛莫能助，最後導致要求「法援」幫助的人受到不公平對待。

立法會議員林大輝2011年10月19日在《星島日報》撰文

有關「荒唐的官司 荒唐的法援」評論的回應

就 貴報昨日（十二月二十三日）的社評「荒唐的官司荒唐的法援」，法援署現作出以下澄清：
社評中提及法援署三次批出法援的資料並不正確。根據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有關的判案書，該案的申索人鄧綺瑜女士（鄧女士）乃由義務律師協助，法援署並無向她批出法援。同時，小額錢債審裁處申索亦不屬法援的涵蓋範圍。

本署亦藉此機會指出，案件在原訟法庭上訴時，雙方均有代表律師，法官是經過聆訊後才裁定鄧女士上訴得直。由於社署就有關裁決上訴至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故此法援署批出法援予鄧女士於上訴法庭進行答辯，並無濫批的情況。

法律援助署署長

（陳瑞理代行）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中國軍方對美在澳大利亞駐軍，拉緊與日、韓、菲、澳新(西蘭)、法澳新(西蘭)泰菲等5組軍事同盟，以及提出「空海一體戰」作戰理論等，均進行了公開批評。觀察家認為，儘管中美軍事關係因為美國對台軍售等問題受到明顯影響，中國軍方也受到國內輿論和民眾要求務實反擊美對台軍售的壓力，但仍能維護防務磋商這一機制，如期舉行例行工作會晤，說明解放軍對兩軍關係高度重視，既關注雙方糾結的敏感問題的處理，又關注兩軍長遠發展和意圖的戰略對話，並為恢復交往勢頭做了許多工作，卓有成效地貫徹「鬥而不破」的方針，較好地保持了進退有據並留餘地。

二是在處理遺留爭議上追求攻守均衡

眾所周知，中印之間一直存在着領土爭議等歷史問題，特別是隨着兩國經濟、國防建設的發展，相互關心、戒心和擔心的問題交織積累，軍方的舉動特別引人注目。有報道稱，中國曾在去年向一位準備訪華的印控克什米爾地區의軍官發放「另紙簽證」，此舉被印度視為中國對印在克什米爾地區主權的質疑，於是單方面暫停了兩國間的防務交流活動。今年來，解放軍加強了與印軍的交流，西藏軍區政委成功率團訪印，特別是12月上旬，馬曉天副總長與印度國防秘書夏爾馬成功主持了中印第四屆防務與安全磋商，就地區安全形勢、兩軍關係以及兩國軍隊建設情況等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觀察家指出，這次磋商雖然無法根除兩軍間的猜疑甚至單方敵意，但也表明中方已排除了「以牙還牙」的簡單做法，對印交流已成為解放軍軍事外交的一個重要着力點。

三是在處置專項爭議上講求攻守均衡

觀察家注意到，今年4、5月間，解放軍高級軍官代表團訪問了包括菲律賓在內的六個亞洲國家；10月份，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在京與越南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書記、國防部長馮光青舉行了會談。觀察家認為，在南海問題日益凸顯的大背景下，中國軍方藉此加強與聲索國國際交流，具有雙重作用，一是可以增進軍事互信，釋除鄰國對中國軍事實力的疑慮；二是可以表明中國軍方對一些熱點問題的態度，以免一些國家誤讀、誤判和作出錯誤舉動，說明加強與周邊國家包括有爭議國家的交流合作仍是中國軍事外交的重點。